

# 點石齋石印書局及其舉業用書的 生產活動

沈俊平

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

## 提 要

點石齋石印書局是申報館的附屬書局，專門承擔印刷石印書的任務。早期主持點石齋的英商美查（Ernest Major，1841-1908）老謀深算，對當時的圖書市場具有敏銳的洞察力。在其長袖善舞的經營下，除出版引人注目的《點石齋畫報》外，還出版石印經史子集、中外輿圖、書畫、碑帖、小說、工具書、畫報，並順應眾多考生的願望，援用石印術的優勢，生產了林林總總、數量可觀、經濟實惠、小而便攜的舉業用書像四書五經講章、鄉會試闡墨、入股文彙選、試帖詩選本、策文選本等，來滿足年輕考生居家遠行時備戰科場、挾帶作弊的需求。好景不長，自美查離開後，隨著石印圖書出版市場競爭的日趨激烈，《申報》出版與廣告業務的蒸蒸日上，觸使精打細算的接棒人調整商業戰略，將重心偏向報章出版業務，減低對圖書出版業務的依賴。這個改變使得點石齋不僅失去了在舉業用書的出版上引領潮流的地位，並在科舉制度廢止前匿跡於在這類圖書的出版上。

**關鍵詞：**清代、點石齋石印書局、石印術、舉業用書、美查、科舉制度、圖書生產

## 一、緒言

點石齋石印書局是近代中國最早採用石印術進行商業性出版的企業。除出版石印經史子集、中外輿圖、書畫、碑帖、小說、工具書等，它還在光緒十年（1884）創辦了引人注目的《點石齋畫報》。《點石齋畫報》的價值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受到學者的注意，除資料歸類、整理、解讀性質的著作外，<sup>1</sup>還有介紹《點石齋畫報》自身及其主編吳友如，<sup>2</sup>以及通過《點石齋畫報》來考察晚清社會生活、<sup>3</sup>大眾文化、<sup>4</sup>新知傳播、<sup>5</sup>傳統質素、<sup>6</sup>全球化想象<sup>7</sup>等的著作和論文，成果豐碩。<sup>8</sup>除《點石齋畫報》外，學術界對點石齋石印書局的其它出版物的重視稍嫌不足，像它在當時所生產的數量可觀，並給它帶來豐厚盈利的舉業用書就是一例。

舉業用書在唐代隨著科舉考試制度的確立便已開始出現。<sup>9</sup>隨著坊刻業的崛

- 
- 1 這些著作有陳平原編，《點石齋畫報選》（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2000）；陳平原、夏曉虹編注，《圖像晚清》（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Don J. Cohn ed., *Vignettes from the Chinese: Lithographs from Shanghai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Hong Kong: Research Centre for Translation,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7) 等。
  - 2 前者有俞月亭，〈我國畫報的始祖——《點石齋畫報》初探〉，《新聞研究資料》，1981年5輯，頁149-181；張毅志，〈中國近代著名的畫報——點石齋畫報〉，《圖書館學刊》，1989年3期，頁56-58；陳平原，〈新聞與石印——《點石齋畫報》之成立〉，《開放時代》，2000年7期，頁60-66等。後者有林樹中，〈點石齋畫報與吳友如〉，《南京藝術學院學報（音樂與表演版）》，1981年2期，頁13-20；鄔國義，〈近代海派新聞畫家吳友如史事考〉，《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1期，頁96-104等。
  - 3 如黃夢紅，〈從點石齋畫報看清末婦女的生活形態〉（南投：暨南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裴丹青，〈從《點石齋畫報》看晚清社會文化的變遷〉（開封：河南大學碩士論文，2005）；殷秀成，〈中西文化碰撞與融合背景下的傳播圖景：《點石齋畫報》研究〉（長沙：湖南師範大學新聞學碩士論文，2009）等。
  - 4 Xiaoqing Ye, *The Dianshizhai Pictorial: Shanghai Urban Life 1884-1898* (Ann Arbor, Mich.: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3).
  - 5 王爾敏，〈中國近代知識普及化傳播之圖說形式——點石齋畫報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期（1990），頁135-172。
  - 6 李孝悌，〈走向世界，還是擁抱鄉野——觀看《點石齋畫報》的不同視野〉，《中國學術》，11期（2002），頁287-293。
  - 7 Rudolf G. Wagner, "Joining the Global Imaginaire: the Shanghai Illustrated Newspaper Dianshizhai huabao," in Wagner, Rudolf G. ed., *Joining the Global Public: Words, Images, and City in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1870-1910*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7), pp. 105-173.
  - 8 吳學文，〈《點石齋畫報》研究綜述〉，《文山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卷3期（2007），頁56-58；謝菁菁，〈《點石齋畫報》研究的三個階段及其學術史意義〉，《江西社會科學》，2010年10期，頁213-219；蘇全有、岳曉傑，〈對《點石齋畫報》研究的回顧與反思〉，《重慶交通大學學報（社科版）》，11卷3期（2011），頁94-100。
  - 9 周彥文，〈論歷代書目中的制舉類書籍〉，《書目季刊》，31卷1期（1997），頁1-3；劉祥光，〈印刷與考試：宋代考試用參考書初探〉，《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17期（2000），頁59。

興，其出版在宋、元、明取得了進展。<sup>10</sup>入清以後，在艱辛的出版環境下，坊刻舉業用書的出版在經歷了清初的低潮後，逐漸呈上揚趨勢，這類圖書的出版在嘉、道年間出現了「如山如海」的繁盛局面。<sup>11</sup>隨著西學東漸，西方印刷術像石印和鉛印輸入中國。<sup>12</sup>石印在出書速度、製作成本、印刷效果等具有木刻和鉛印所無可比擬的優勢，使它成為晚清慣用的印刷術。而引領這股潮流的就是點石齋石印書局。

本文以點石齋所生產的舉業用書為對象，探討它在十九世紀最後二十多年的舉業用書的生產活動的興衰起落，以及它對晚清石印出版業的影響，希望通過這一側面加深人們對點石齋乃至晚清石印書局的圖書生產活動的了解。

## 二、點石齋石印書局的成立與發展

中國傳統的圖書生產體系，大致分為官刻、家刻及坊刻三部分，它們主要採用雕版印刷術進行圖書的生產。清初各地的反清運動持續近二十年，朝廷採取高壓政策進行殘酷鎮壓。經濟文化較發達的南方各省，經過清軍洗劫，已經是財物焚掠殆盡，城鎮荒涼，書坊業同其他工商業一樣，急劇衰落。康熙二十年（1681），三藩之亂平定後，清廷採取與民休息的政策，社會生產力逐漸恢復，書坊業才回復生機。書坊中心集中在北京、蘇州、廣州，新興的書坊刻書地區也為數甚眾，揚州、成都、重慶、太原、聊城等都有刻書的記錄。<sup>13</sup>和前代一樣，書坊刻書以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用書、小說、戲曲、啟蒙讀物，以及舉業用書為主。<sup>14</sup>

舉業用書問世以來，一直引起朝野人士對其所造成的負面影響的關注。為矯正

10 關於宋、元、明三朝舉業用書的出版情況，可參閱劉祥光，〈印刷與考試：宋代考試用參考書初探〉，頁 57-90；劉祥光，〈宋代的時文刊本與考試文化〉，《臺大文史哲學報》，75 期（2011），頁 35-86；祝尚書，〈宋代科舉與文學考論〉（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頁 261-283；沈俊平，〈元代坊刻考試用書的生產活動〉，《書目季刊》，44 卷 2 期（2010），頁 43-80；沈俊平，〈舉業津梁：明中葉以後坊刻制舉用書的出版與流通〉（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9）；Kai-wing Chow,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1 (清) 龔自珍，〈與人箋〉，《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第五輯，頁 344。關於清代舊式書坊刊刻舉業用書的情況，可參閱沈俊平，〈清代坊刻考試用書的影響與朝廷的回應〉，《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54 期（2012），頁 69-79。

12 Cynthia Brokaw, "Commercial Woodblock Publishing in the Qing (1644-1911) and the Transition to Modern Print Technology," in Cynthia Brokaw et al eds, *From Woodblocks to the Internet: Chinese Publishing and Print Culture in Transition, circa 1800 to 2008* (Leiden; Boston: Brill, 2010), p. 44.

13 戚福康，《中國古代書坊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頁 256、275-277。

14 陳力，《中國圖書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頁 326-327。

它們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它們一度在宋、明，以及清初遭到查禁，於「刊書之處，遍為飭禁等語」。<sup>15</sup>但所頒布的禁令，往往影響一時，無法維持長久，成效有限，發展到雍、乾交際年間甚至出現「時文選本，汗牛充棟」的盛況。<sup>16</sup>龔自珍（1792-1841）曾用「如山如海」來形容他所目睹的道光年間舉業用書的出版的盛況。<sup>17</sup>民國初年詩人劉禹生（1873-1952）發現，從咸豐以至光緒中葉崇尚實學的氛圍中，仍存在「人崇墨卷，士不讀書」的劣風。<sup>18</sup>凡此種種，不僅說明坊刻舉業用書刊行之盛，流通之廣，「山僻小鎮」皆有這類讀物的踪跡，<sup>19</sup>也說明在利益的強力誘惑下，儘管「刊書之處」「遍為飭禁等語」，還是有書坊主視若不見，甘冒懲處的危險刊行能夠給他們帶來厚利的舉業用書。

隨著西學東漸，西方印刷術傳入中國。<sup>20</sup>石印術在清道光年間通過傳教士傳入中國。他們以傳播基督教為目的，其印刷品也以佈道小冊子為多。<sup>21</sup>由於經費有限，他們想方設法降低印刷品的成本，曾就此進行了調查。他們以印刷兩千本中文《聖經》為基礎，估算了雕版、石印、活字印刷的成本，發現石印不僅成本低，且印刷效果好、速度快。<sup>22</sup>而運用石印進行商業性圖書生產的，是以點石齋石印書局為最早。其創辦人英商美查（Ernest Major，1841-1908）於同治十一年（1872）與友人合資成立申報館（圖1），採用鉛印出版《申報》。<sup>23</sup>早期《申報》的每日印量

- 
- 15（清）杜受田等修纂，〈禁止刊賣刪經時務策〉，《欽定科場條例》（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歷代科舉文獻集成，第5冊，頁2670），卷三四。
- 16（清）永瑢等，〈集部·總集類五〉，《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95），卷一九〇，頁1729。
- 17（清）龔自珍，〈與人箋〉，頁344。
- 18（清）劉禹生，〈清代之教學〉，《世載堂雜憶》（北京：中華書局，1960），頁13。
- 19（清）實錄館修纂，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整理，《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乾隆五十八年七月戊午，頁163。
- 20 Cynthia Brokaw, "Commercial Woodblock Publishing in the Qing (1644-1911) and the Transition to Modern Print Technology," p. 44.
- 21 韓琦、王揚宗，〈石印術的傳入與興衰〉，宋原放主編，《中國出版史料·近代部分·3》（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頁392-395；蔡盛琦〈清末點石齋石印書局的興衰〉，《國史館學術集刊》，1期（2001），頁4-5。
- 22 Typographus Sinensis, "Estimate of the proportionate expense of Xylography, Lithography, and Typography, as applied to Chinese printing; view of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Chinese Repository* 3 (1834): 246-249.
- 23 關於《申報》的創辦經過，可參閱〈本報原始〉，《申報》，1947年9月20日，17版；〈記美查〉，《申報》，1947年9月20日，21版；徐載平、徐瑞芳編，《清末四十年申報史料》（北京：新華出版社，1988），頁2-3；宋軍，《申報的興衰》（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頁7-8；文娟，《結緣與流變——申報館與中國近代小說》（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頁8-11；Roswell S. Britton, *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 (Shanghai, Kelly & Walsh, 1933; reprinted Taipei: Ch'eng-wen Publishing Compang, 1966), pp. 63-64；Xiaoqing Ye, *The Dianshizhai Pictorial*, p.4.

約一千份左右，數量不多。<sup>24</sup> 為了增加機器的使用率，精打細算的美查利用機器空閒的時候承印圖書。申報館在光緒二年（1876）刊登啓事云：

本局開張上海洋涇浜棋盤街北首朝東洋房，自置機器鉛字專印各種書籍，大小版式俱全。除本局自印發售外，兼可為人代印。凡代印之書，首五百部起統照自印之書核估價目，遞加至二千部統計九折，至三千部統計八折。若五百部以下應以工料紙墨多寡難易為準，其價似宜酌加。倘託印之書易於銷售，本局可以自印則不加價，並酌送數十部以酬稿本。<sup>25</sup>

啓事中清楚列明了承印圖書的收費。申報館之所以出版書籍，「出發點還是為了發展營業，目的不外就是謀利盈利」。<sup>26</sup>

決定出版者確立選題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對時代趨向的探測，對目標讀者的定位，對市場需求的估計等。隨著歷史的發展，科舉制度的弊端暴露得愈加明顯，頗遭有識之士詬病。申報館與時議不諧，在《申報》創辦初期刊登的〈考試用人論〉中稱讚中國的科舉制度良好，希望「他國皆用中國之法」，「共效中國之法制，以同歸於聖賢之教」，而免流為「異端」。<sup>27</sup> 《申報》所以歌頌科舉制度，與時任該報總主筆的蔣其章（1842-？）及其團隊成員的出身背景不無關係。蔣其章在同治九年（1870）鄉試中舉，加入《申報》擔任第一任主筆期間仍汲汲於功名，光緒三年（1877）得償所願，於會試金榜題名。由於對科舉功名的迷戀，很自然地就利用他可掌握的平臺表露出對科舉仕途的執著。<sup>28</sup> 申報館所出版的第一本書——《文苑菁華》（即一本收錄 500 多篇「近人所作」制藝的文集）就是他所負責編輯的。<sup>29</sup> 襄理筆政的錢昕伯（1833-？）、何鏞（1841-1894）等也都是江浙一帶的落第秀才。<sup>30</sup> 在晚清仕途日益擁塞、讀書人職業競爭日趨激烈的情勢下，報人的社會地位雖低下，但穩定的職業和薪水畢竟為仕途無期的文人敞開了一條傳統途徑之外的謀生之道。不少報人念念不忘功名之未就，屢試科考，落第後重回報館。<sup>31</sup> 這個團隊

24 李嵩生，〈本報之沿革〉，申報館編，《最近之五十年》（上海：申報館，1923），頁 31。

25 〈機器印書局〉，《申報》，1876 年 7 月 10 日，5 版。

26 王建輝，〈申報館：報業之外的圖書出版〉，氏著，《出版與近代文明》（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6），頁 118。

27 〈考試用人論〉，《申報》，1872 年 5 月 18 日，1 版。

28 關於蔣其章的生平事跡，可參閱邵志擇，〈《申報》第一任主筆蔣芷湘考略〉，《新聞與傳播研究》，15 卷 5 期（2008），頁 55-61。

29 （清）蔡爾康，《申報館書目》（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中國近代古籍出版發行史料叢刊，第 10 冊），頁 421。

30 文娟，《結緣與流變——申報館與中國近代小說》，頁 15-17。

31 程麗紅，《清代報人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頁 160-164，179-184；Xiaoqing Ye, *The Dianshizhai Pictorial*, pp. 13-14。

成員的出身背景，在一定的程度上決定了報館附屬書局的出版方向。

雖然科舉積弊日深，但當時熱衷於功名的人「忙於奔走鑽營，博取富貴。一般學子，則從事試帖制藝，迷戀於科舉一途。」<sup>32</sup> 明末清初名士顧炎武（1613-1682）曾粗略統計文生員的數字，指出：「合天下之生員，縣以三百計，不下五十萬人。」<sup>33</sup> 據張仲禮統計，太平天國前的文生員總數約五十三萬，與顧炎武的估算頗為接近，太平天國後增加百分二十一，約六十四萬。<sup>34</sup> 這數目上逾六十萬的生員是舉業用書的基本讀者群，從這裏可窺探到舉業用書市場的巨大潛力。考試是改變一個人命運地位的重要途徑，如何脫穎而出，如何應試才能中第，是士子心中最重要的問題，故而當時考生「平日所孜孜以求之者，不過三場程式、八股聲調、歷科試卷、高頭講章，以是為利祿之資，功名之券」。<sup>35</sup> 這裡反映舉業用書的市場需求之大，出版這類圖書勢必能給民營書局帶來豐厚利潤。在這些理念的驅動下，在上海已生活了十多年，「能通中國言語文字」，<sup>36</sup> 對中國文化也相當認識的美查乃將其中一個出版選題鎖定在遭受不少朝野有識之士圍剿，卻又深受專以投機取巧為能事的考生推崇的舉業用書，並在光緒二年（1876）四月在《申報》刊登〈招印時文〉的啟事：

四子文為操觚家所尚，近來如有選家欲將時文託本館代排代印，計文百篇。照快心編版口者，每五百部連紙價收洋銀四十七元。照書舫錄版口者，每五百部連紙價收洋銀六十六元。如欲增印五百部者，照前價減半遞加。百頁之書約五日當可完工，惟版口之大小不同，或排印之遲速稍異。倘蒙賜顧，祈即早來本館議定為盼。<sup>37</sup>

這則徵求時文選本的啟事，也起著出版舉業用書前的造勢作用，引起潛在讀者的關注，注意購買。光緒三年（1877）六月上旬，申報館採用鉛活字推出《文苑菁華》，並在同月下旬推出了一部收錄適合備考用的《金壺七墨》的時事文選，從中獲得豐厚的收益。<sup>38</sup> 除此之外，還出版發售各種「奪標」書籍：

32 〈本報原始〉，《申報》，1947年9月20日，17版。

33 （清）顧炎武，〈生員論〉上，《顧亭林詩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一，頁21。

34 張仲禮著，李榮昌譯，《中國紳士——關於其在19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頁150-151。

35 〈延師說〉，《申報》，1890年4月2日，1版。

36 〈報館開幕偉人美查事略〉，《申報》，1908年3月29日，1版。

37 〈招印時文〉，《申報》，1876年5月5日，1版。

38 魯道夫·瓦格納（Rudolf G. Wagner），〈申報館早期的書籍出版（1872-1875）〉，陳平原、王德威、商偉編，《晚明與晚清：歷史傳承與文化創新》（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頁169-171。

本館今新選試帖初集（按：書名為《尊聞閣詩選初集》）已成，於下禮拜出售，可稱為揣摩之利器。又有縮本《廣治平略》，為三場所必需者，於二十日後出售。又已印成縮本之《欽定四庫全書簡明日錄》，亦係條對考據之書，刻已售出多部，人皆寶之。並前選之四書文曰《文苑菁華》，五經文曰《經義新畬》，皆足為首次兩場之鴻寶。而《詩句題解韻編》四集，亦係文人必備之書。以上三種尚存無多，祈諸君早日來館購取。<sup>39</sup>

申報館在開始出版圖書的首三年，在出版報章之餘，每年平均出版舉業用書兩部，可見它對這類圖書市場的重視。

美查覺察到採用鉛印的印刷效果不盡理想，不過很快地就在石印的身上找到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他發現石印不僅「皆能與原本不爽鎔銖，且神采更覺煥發。至照成縮本，尤極精工」。於是在光緒五年（1879）斥巨資「在泰西購得新式石印機器一付，照印各式書畫」。<sup>40</sup> 這部機器來到申報館後，美查在同年八月十八日成立了「點石齋書畫室」（後改為「點石齋石印書局」），成為近代中國最早採用石印術進行商業性出版的企業（圖2）。<sup>41</sup> 申報館和點石齋分別承擔印刷鉛印書和石印書的任務。<sup>42</sup>

點石齋印刷所設於南京路泥城橋堍（今西藏北路），門市部設於拋球場（今南京東路河南中路口）。<sup>43</sup> 聘用王菊人為買辦，購置石印全張機三部，曾短期邀請土山灣印書館邱子昂為技術指導。點石齋初創時主要業務為楹聯、碑帖及名畫等傳統書畫作品的翻刻，<sup>44</sup> 自光緒五年初石印《鴻雪因緣圖記》大賣之後，才開始真正走向了出版石印書籍的道路，並在翌年三月出版讓它獲利甚巨的《康熙字典》。<sup>45</sup> 它在光緒九年（1883）五月刊登的啟事宣稱「石印縮本書籍，創自本齋。每一書出購

39 〈發售奪標各種書籍〉，《申報》，1879年7月31日，1版。「尊聞閣」是「錢塘吳翰譚」為《申報》的房屋而手書的題字。「過去廳堂齋屋，大都有題字，尤其是文人，更喜歡題上些風雅的匾額。《申報》是文人雅士朝夕相處之所，當然不能免俗」。「尊聞閣」含有「尊重新聞事業」的意思。見〈尊聞閣〉，《申報》，1947年9月20日，15版。

40 〈點石齋印售書籍圖畫碑帖楹聯價目〉，《申報》，1879年5月18日，1版。

41 姚公鶴，《上海閒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頁12。

42 子治標點，〈點石齋申昌書室廣告五件〉，宋原放主編，《中國出版史料·近代部分·3》，頁207。

43 《上海出版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出版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頁224。

44 參見點石齋在光緒四年（1878）十二月八日《申報》登載「楹聯出售」、光緒五年（1879）九月二日所載「續印楹聯立軸出售」、十月十三日所在「新印名畫出售」等啟事。

45 點石齋出售的《康熙字典》告白刊登在《申報》，1880年4月14日，1版。

者爭先恐後」。<sup>46</sup> 同年二月的啟事稱：

本齋用石印照相法所印各書，不特字樣縮小，以便行篋攜帶，並務求點畫分明，俾閱者不費目力，此固久為海內文人所賞鑑，無待贅者。茲又將《四書味根錄》飭工照印，其字雖較原本略小，然仍縷晰條分，無論童叟，即燈下亦堪披誦，兼之紙色潔白，墨光濃淡相宜，裝潢亦極精雅。<sup>47</sup>

說明石印本具有小而便攜、點畫分明的優點。同時，石印技術印刷時間短、印量大、成本又較木刻便宜許多。點石齋在《申報》刊登〈價廉石印家譜雜作等〉告白稱：

今本齋另外新購一石印機器，可以代印各種書籍，價較從前加廉。今議定代印書籍等，以二百本為率，以每塊石印連史紙半張起算，除重寫，抄寫費不再其內，每百字洋三分半；每半張連史紙僅需洋一分。比如，連史紙半張分四頁，書內六十頁共石板十五塊，印書二百本共連史紙三千個半張，以每張一分計，共洋三十元。如書內共三萬字除抄寫價外，計洋七元五角；共書二百本，不連訂工只須洋三十七元五角。倘自己刻木板，其費約四十五元，刷印及紙料尚不在內也。兩相比較，實甚便宜。況石印之書比木板更覺可觀乎？又如書頁欲縮小、加大，亦照半張核算。<sup>48</sup>

根據告白中所述石印兩百本不算裝訂錢，只須三十七元五角來計算，故石印一本書的成本僅一角八分多，即使算上裝訂費，石印書的成本也相當低，書價也因而較木版書低廉。「以《康熙字典》售價為例：石印各種版本不同，自一元六角至三元。木版大字的售價至十五元」。<sup>49</sup> 一部木版書為同書石印本價格的二至五倍，因而石印書更易受到讀者歡迎。<sup>50</sup> 而讓「點石齋石印第一獲利之書」的就是為《康熙字典》。它「第一批印四萬部，不數月售罄。第二批印六萬部，適某科舉子北上會試，道出滬上，每名率購備五六部，以作自用及贈友之需，故又不數月而罄。書業見獲利之巨且易」，各地商人紛紛成立石印書局，以分得一片天下。<sup>51</sup> 除傳統書畫作品的翻

46 《〈四書味根錄〉出售》，《申報》，1883年6月17日，1版。

47 《〈四書味根錄〉出售》，《申報》，1883年3月12日，1版。

48 〈價廉石印家譜雜作等〉，《申報》，1880年4月8日，1版。

49 "Photo-lithographic Printing in Shanghai," *North China Herald*, no.1138, May 25, 1889, p. 633.

50 Christopher A. Reed, *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1937* (Vancouver, B.C.: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4), pp.101-102.

51 姚公鶴，《上海閒話》，頁12。一些石印書局眼見點石齋石印的《康熙字典》暢銷，乃不擇手段地進行翻刻，其裝潢與點石齋版《康熙字典》無甚差別，「惟細閱書中訛字不勝枚舉」。點石齋「誠恐閱者不察，轉為本齋聲明之累」，乃在光緒八年在《申報》刊登告白提醒讀者認清購買，見〈點石齋告白〉，《申報》，1882年4月30日，1版。

刻和工具書外，點石齋還出版古籍圖書、中外輿圖、畫報以及本文討論的舉業用書。<sup>52</sup>

點石齋一方面承接印刷外界的來件，另一方面搜集孤本、善本、珍本出版。<sup>53</sup> 點石齋在創辦後的頭五、六年，主要仰賴藏書主人和文人供稿，把精力專注在出版和發行。中華書局創辦人陸費逵（1886-1941）回憶：「當時的石印書局，因自己不編譯，專翻印古書，所以沒有什麼編譯所的名稱。大概在發行所或印刷所另闢一室，專從事校閱。總校一人，一定要翰林或進士出身，月薪三十兩，分校若干人，舉人或秀才出身，月薪十兩左右。搜覓到一種書，經理決定要印，便照相落石，打清樣校對，校對便印訂，所以出書是很快的。」<sup>54</sup> 反映的是大多數石印書局在十九世紀後三十年的經營方式。

申報館初創期間，為了解決書稿短缺的問題，不時在《申報》刊登「蒐書」啟事徵求或徵購佳本珍本書籍。光緒五年六月在《申報》刊：

點石齋自創行石印以來，印成各種書籍、碑帖、楹聯等皆精雅絕倫，與原本分毫不爽。茲擬廣搜各種奇蹟印以問世，諸君如藏有圖書之白紙書籍及古名人法帖楹聯等，即望不吝惠示，或願得善價而沽，或印成後酬數十部均無不可。統祈俯鑒，無任盼切之至。<sup>55</sup>

它在光緒六年二月刊登的啟事明確指定訪購初印《佩文韻府》：「本館今欲訪購殿本初印連史帙《佩文韻府》一部，價值照時。諸君有願出售者，請即攜書來館面議。」<sup>56</sup>

點石齋也在《申報》刊登「搜書」啟事。光緒八年（1882），刊登〈蒐羅殿板書及各種初印書籍告白〉「購求初印白棉紙殿板《淵鑑類函》、《子史精華》，並初印白棉紙《皇清經解》、《經籍纂詁》等書。如海內藏書君子不吝惠教，即希寄至本齋議值。果其紙張潔白，點畫精湛無誤者，本齋不惜重值購閱也。」<sup>57</sup> 光緒九年（1883）刊啟事購覓「殿板初印白紙」《十三經註疏》及《三通》兩書。<sup>58</sup> 若藏書者願意將所藏珍本出讓出版，都可與點石齋議價。點石齋也靈活地處理出讓者的要

52 蔡盛琦，〈清末點石齋石印書局的興衰〉，頁 11-19。

53 徐載平、徐瑞芳編，〈清末四十年申報史料〉，頁 335。

54 陸費逵，〈六十年來中國之出版業與印刷業〉，《申報月刊》，1 卷 1 期（1932），頁 14。

55 〈點石齋蒐書啟〉，《申報》，1879 年 8 月 13 日，1 版。

56 〈訪購初印《佩文韻府》〉，《申報》，1880 年 3 月 31 日，1 版。

57 〈蒐羅殿板書及各種初印書籍告白〉，《申報》，1882 年 7 月 15 日，1 版。

58 〈搜書〉，《申報》，1883 年 9 月 30 日，1 版。

求，他們或可選擇得到「善價」，或書印成後「送書數十部或數百部」。<sup>59</sup>

到了光緒十一年（1885）左右，石印市場擴大，有利可圖，點石齋為佔取更大的市場份額，開始組織隊伍編撰圖書。在其出版物中，以吳友如等編繪的《點石齋畫報》最引人矚目。它是近代中國影響最大的畫報，反映了清末政治、社會的風貌，為後世研究近代社會政治歷史提供了形象的史料。<sup>60</sup> 另外，點石齋也保持申報館一致的出版方向，充分地利用了石印的優勢，將其中的一個重心放在易於編撰而又暢銷的舉業用書。

### 三、舉業用書的生產活動的起落

從點石齋舉業用書的生產的發展過程來看，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初創至鼎盛期（1879-1889，美查總攬點石齋業務時期）與衰落至消亡期（1890-1905，美查回英至科舉考試廢止時期）。

#### （一）初創至鼎盛期（1879-1889）

學者指出：「起初，石印本多為士子學習應試的參考書。如《康熙字典》、《策學備纂》、《事類統編》、《佩文韻府》、《詩句解題總匯》之類。石印本印刷快捷，能印製十分清晰的袖珍小本，極便攜帶，故深受士子歡迎。」<sup>61</sup> 陸費逵指出，當時「石印業印書多而營業盛」，主要是科舉時代考生攜帶便利的緣故，石印書局為此出版「各種經書及《大題文府》、《小題十萬選》一類的書」，它們「都縮成極小的版本」。<sup>62</sup> 雖是「蠅頭小字」，但它們「筆畫清楚，翻閱既便，懷袖尤宜」。<sup>63</sup> 當時報章報道：「大部分（石）印的書字體都很小，奇怪的是居然有那麼多的人喜歡買這樣小的書。」其中「購買石印本的人大半是趕考的舉子，年輕，目力好，他們不要寬邊大字，而喜歡旅行時便於攜帶的小本。舉子們需要趕路，又喜歡帶書。」<sup>64</sup> 出版石印本的成本低，允許石印局以較木刻書更為低廉的價格將圖書售賣給士子，是它們深受士子，特別是經濟能力較弱的士子青睞的關鍵。必須指出的是，這些石印縮本

59 〈蒐書〉，《申報》，1879年10月9日，1版。

60 Christopher A. Reed, *Gutenberg in Shanghai*, pp. 104-114.

61 韓琦、王揚宗，〈石印術的傳入與興衰〉，頁400。

62 陸費逵，〈六十年來中國之出版業與印刷業〉，頁14。

63 向迪琮，〈上海點石齋石印書及其繼起者〉，上海市文史館、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室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上海地方史資料·四》（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頁246。

64 "Photo-lithographic Printing in Shanghai," p. 633.

雖「極為精巧簡便」，深受年輕士子喜愛，「惟嫌字跡過於細小，殊耗精神，蓋久視則眼花，若用顯微鏡，又易於頭眩，則難經久，為經書家所不取，是亦美中不足耳！」（如圖3）。<sup>65</sup>

這些翻開後面積僅有手掌般大小的微型舉業用書除便於攜帶外，亦可供考生挾帶作弊。清政府曾為遏制這股惡風，頒佈了一整套嚴密的措施。<sup>66</sup>然而，不論搜檢制度如何嚴格，也不論對違禁者懲處如何嚴厲，都不曾阻止挾帶作弊。相反，入闈挾帶之風日盛一日，手段也越來越巧妙。<sup>67</sup>《清稗類鈔》有以下一段文字記述當時挾帶作弊情形：

考試功令，不許夾帶片紙只字，大小一切考試皆然。……道、咸前，大小科場搜檢至嚴，有至解衣脫履者。同治以後，禁網漸寬，搜檢者不甚深究，於是詐偽百出。入場者，輒以石印小書濟之，或寫蠅頭書，私藏於果餅及衣帶中，並以所攜考籃酒壺與研之屬，皆為夾底而藏之，甚至有帽頂兩層韉底雙屨者。更有賄囑皂隸，冀免搜檢。至光緒壬午科，應京兆者至萬六千人，士子咸熙攘而來，但聞番役高唱搜過而已。至壬辰會試後，搜檢之例雖未廢，乃並此聲而無之矣。<sup>68</sup>

考生利用科場搜檢愈加鬆弛的漏洞，挾帶石印書或蠅頭書進入試場，其手段可謂極盡刁鑽之能事。愈到後來，科場搜檢形同虛設，「由吏役高呼一聲搜過，掩耳盜鈴」，「後則此聲亦寂無聞，任士子之隨意挾書矣」。<sup>69</sup>考生肆無忌憚地將作弊工具像袖珍石印本帶入考場。在一定的程度上，石印書小而便攜的優點也助長縱容了挾帶作弊之風。

清初鄉、會試的考試內容與明代相同，順治初年規定：鄉、會試「首場四書三題、五經各四題，士子各占一經」，「二場論一道，判五道，詔、誥、表內科一道，三場經史時務策五道」。「鄉、會試首場試八股文」。鄉、會試對八股文的寫作內容有嚴格的規定，要求以程朱理學為標準。<sup>70</sup>此後，鄉、會試的考試內容多調

65 (清) 蔡床舊主編，〈石印書籍〉，《新輯上海彝場景緻記》（北京：學苑出版社，2010，中國稀見地方史料集成，第18冊，頁245），卷二。

66 (清) 杜受田等修纂，〈關防·搜檢士子〉，《欽定科場條例》，卷二九，頁2633-2634。

67 李國榮，〈清代科場夾帶作弊的防範措施〉，《中國考試》，2004年7期，頁36。

68 (清) 徐珂，〈搜檢〉，《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第2冊，頁586-587。據商衍鑒追憶：「入場搜檢，向例甚嚴，不許夾袋成文與書籍，以後較寬，不過循行故事而已。」氏著，《清代科舉考試述錄及有關著作》（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頁431-432。

69 商衍鑒，《清代科舉考試述錄及有關著作》，頁70。

70 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編纂，〈選舉三〉，《清史稿校註》（臺北：國史館，1986），卷一一五，頁3171-3172。

整。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規定考試內容為：初場為四書文三篇、五言八韻詩一首；二場，五經文各一篇；三場，策問五道。這個規定一直維持到戊戌變法以前。

美查主持點石齋期間，抓緊士子醉心科舉功名的時機，刊行了約六十種的舉業用書來滿足他們全方位的備考需求，也實現了美查謀利的目的。點石齋在光緒十四年（1888）七月在《申報》刊登啟事稱：「本齋刊行石印於今已十一年矣。歷稽十一年來，印出書籍不下數百種……近本齋每逢大比必出新書數種，即為《經策通纂》一書包羅之富有不必言，而其中珍本秘冊，他人懸重金而不得者，無不一再蒐入，洵為獨出冠時，非他種經策書可比。其餘如《大題觀海》之美備，《五經文準》之新穎，均屬傑作，購者自知。」<sup>71</sup> 透露出點石齋非常重視舉業用書的出版。它在成立初期主要出版供考生學習參考的工具書如《康熙字典》、《佩文韻府》等。隨後將這類圖書的出版方向鎖定在幫助投機士子學習與揣摩用的暢銷圖書如四書五經講章、鄉會試闡墨、八股時文彙選、策問選本、試帖詩選本等。<sup>72</sup>

### 1. 闡墨

闡墨是幫助士子掌握考官好尚、時文風向的最佳途徑。商衍鑾指出：「八股謂之時文，亦以時過則遷，違時之舊文已去，合時之新文代興。」<sup>73</sup> 八股文風尚的微妙變化，就需要「揣摩」。《儒林外史》中的高翰林就深諳其中奧妙，說：「老先生（按：萬中書），『揣摩』二字，就是這舉業的金針了。小弟鄉試的那三篇拙作，沒有一句話是杜撰，字字都是有來歷的，所以才得僥倖。若是不知道揣摩，就是聖人也是不中的。」<sup>74</sup> 而要跟風趨時，剛出爐的鄉、會試三場闡墨在這方面就起著響導的作用。從咸豐以至光緒中葉年，一些士子對闡墨趨之若鶩，出現「人崇墨卷，士不讀書」的劣風。清末小說《九尾龜》中的人物王伯深在「沒有中舉人的時候」，就曾「抱著一部直省闡墨，拼命揣摩」。<sup>75</sup> 申報館也極其重視這個擁有龐大市場的讀物的出版，它在《申報》刊登〈精印各省闡墨告白〉稱：「本館每遇鄉會試之年揭曉後，必趕印闡墨出售以饗諸君子先為快之心。」<sup>76</sup> 點石齋成立後，也跟隨母公

71 〈分股各書售書鋪告白〉，《申報》，1888年8月10日，1版。

72 詳參文末附錄〈點石齋石印書局舉業用書出版簡目〉。

73 商衍鑾，《清代科舉考試述錄及有關著作》，頁257。

74（清）吳敬梓，〈翰林高談龍虎榜，中書冒占鳳凰池〉，《儒林外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49回，頁563-564。

75（清）張春帆，〈章秋谷有心試名妓 王太史臨老入花叢〉，《九尾龜》（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0），64回，頁259。

76 〈精印各省闡墨告白〉，《申報》，1889年10月31日，1版。

司的經營重點，不忘插足這個擁有龐大市場的讀物的出版，有《乙酉科十八省闈墨》、《丙戌科會墨》、《國朝元魁墨萃》、《傳選戊子直省鄉墨》等。

## 2. 四書五經類

明代科考偏重首場，<sup>77</sup> 截至清末科舉「雖分三場，而只重首場」的現象依然普遍。<sup>78</sup> 首場從四書五經中出題，故自明代以來，書坊編刊了多不勝數闡發四書五經意旨的講章和闡釋四書五經人物事物的參考書。參考誦讀自前朝已有的四書五經類考試輔助讀物，幾乎是當時所有士子的共同行為。舊式書坊刊印了明清文人編撰的這類圖書，其數極多。<sup>79</sup> 點石齋承舊式書坊的作業方式，也出版了不少這類圖書，包括：《四書味根錄》、《四書典制類聯音註》（圖4）、《五經體註》、《五經備旨》、《四書典林》、《增廣四書小題題鏡》、《五車樓五訂四書》、《四書典故竅》、《四書圖考》、《九種彙解》、《四書撮言》、《四書古註群義彙解》、《增補三層四書味根錄》等。

## 3. 八股時文

四書五經類參考書提供的僅是對經典的闡釋，對一些急功近利的士子來說並無吸引力，他們迫切需要的是一些像闈墨那樣直接允許他們揣摩取法的舉業用書。但闈墨所能提供的篇數離駭備甚遠，於是清代書坊也沿襲明代書坊的傳統，刊行八股時文彙選來滿足士子的備考需要。「自石印之法行而刊制藝以供揣摩者」，亦「幾於汗牛充棟」。<sup>80</sup> 光緒末年，一些士子甚至「專攻制藝，不事經史」，<sup>81</sup> 「胸中之根柢，不過八股數百篇」。<sup>82</sup> 八股時文彙選也是點石齋的重點出版物。

八股時文分大題、小題兩類。戴名世（1653-1713）云：「且夫制舉業者，其體亦分為二：曰大題，曰小題。小題者，場屋命題之所不及，而郡縣有司及督學使者

77 (清)永瑤等，〈經部·四書類存目〉，《四庫全書總目》，卷三七，頁310。

78 闕名，〈變通文武考試舊章說〉，高時良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頁616。關於明清科考重首場考試的論述，可參閱侯美珍，〈明清科舉取士「重首場」現象的探討〉，《臺大中文學報》，23期（2005），頁323-368。

79 詳參沈俊平，《舉業津梁：明中葉以後坊刻制舉用書的生產與流通》，頁181-201；沈俊平，〈清代坊刻考試用書的影響與朝廷的回應〉，頁74-75。

80 〈歷代名稿彙選出書〉，《申報》，1889年2月15日，4版。

81 (清)劉大鵬遺著，喬志強標註，《退想齋日記》（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光緒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1897年10月21日），頁76。

82 公奴（夏清貽），〈金陵賣書記〉，《中國出版史料·近代部分·3》，頁312。

之所以試童子者也。」<sup>83</sup> 據戴氏所言，則大題用在鄉、會試出題，小題用在小試中。大題的題意比較完整，又分連章題、全章題、數節題、一節題、數句題、單句題等等。當時以「大題」為名的彙選有《大題三萬選》、《大題五萬選》、《大題文府》、《大題觀海》、《大題鴻雋》、《大題多寶船》、《大題連章文府》、《大題文鵠》、《大題文淵》、《大題文彙》、《大題文》、《大題分類文鈔》等。其中一些是點石齋承印、重印或「延請名宿」編輯的，前兩者包括《大題文富》、《大題文府》等等。光緒十二年（1886）六月，點石齋主人在《申報》刊登〈搜印大題文告白〉：

朝廷以制藝取士，士舍是靡由進身，而所挾之技則鋒利可自主也，刻本已汗牛充棟，然皆習見不鮮。本齋茲特敦聘名才遴選大題文二萬篇，均取理法清真，詞句雅正之文，以作觀摩。善本一切冷淡庸濫，難邀知遇，及《大題文彙》、《（大題）文府》，凡已經石印者概不收列一篇。惟是篇章，既富選擇仍精深，憾所見未廣，尚希海內士林有藏先輩稿本、書院課作、近今窗課，不吝金玉，郵寄本齋，即付收條為據。或選入後酌送潤儀，或印出後酌酬一部，均無不可。其有名人鉅製，多士傳抄一文而數處寄來，本齋均以先到者選用。至原稿之選與不選，一概未能寄還。<sup>84</sup>

點石齋向民間徵集大題文並延請名宿編定的大題文彙選有《大題文彙》和《大題觀海》兩種。

小題產生於成化之際而盛行於萬曆年間。<sup>85</sup> 小題在乾隆以前多用在童試，至乾隆初年方有較大的轉變。黃安濤（1777-1847）云：「乾隆間，會試、鄉試題多用搭截及小題。」<sup>86</sup> 乾隆九年（1744），鑒於科場擬題、懷挾之風，順天鄉試遂出「略冷」之小題以防倖獲，這是小題從小試躋身鄉、會試之始。<sup>87</sup> 小題大概可分成兩類，一為題目割截，不完整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截搭題。截搭題應是在萬曆年間小題盛行時順勢而生。科考所用截搭題，題目文字皆有上下相連、前後的關係，非可東抄西襲，拼湊成文。一為「褻而不經」者，題雖完整，然意義不能冠冕正大，甚至詆毀孔孟、流於淫穢。兩者都因違背制藝乃為闡聖明道的本意，而為大雅

83（清）戴名世撰，王樹民編校，〈己卯行書小題序〉，《戴名世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四，頁100。

84 〈搜印大題文告白〉，《申報》，1886年7月10日，1版。

85 侯美珍，〈明清科舉八股小題文研究〉，《臺大中文學報》，25期（2006），頁179-189。

86 梁章鉅撰，陳居淵點校，《制藝叢話》（上海：上海書店，2001），卷二二，頁429。

87 王先謙，〈乾隆二十〉，《東華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續修四庫全書，第372冊，頁5）；侯美珍，〈明清科舉八股小題文研究〉，頁161。

所抨擊。然而，批評小題的聲浪雖不曾停歇，但它不僅未被淘汰，更由於其在防止士子擬題、剽竊，以及提升考官的閱卷速度、鑑別文章高下等方面，有明顯的效果，故而在鄉、會試中扮演的角色益形重要。<sup>88</sup> 書局意識到重心的變遷，也生產大量的小題文集如《小題文府》、《小題森寶》、《小題三萬選》、《小題四萬選》、《小題十萬選》、《小題珍珠船》、《小題宗海》、《小題目耕齋》、《小題正鵠》、《小題題鏡》、《小題多寶船》、《小題文藪》等來滿足士子備考的需要。更有題為「巧搭」、「小搭」、「長搭」、「搭截」者，如《巧搭文府》、《巧搭大觀》、《巧搭清新》、《巧搭網珊》、《小搭珠華》、《小搭徑寸珠》、《長搭一新》、《長搭正軌》、《搭截精華》、《搭截奪標》等。點石齋也趕上了出版小題文集的熱潮，最早的是光緒九年（1883）某浙西文人託印的《小題文藪》。此外，還有是亦軒主人託印的《小搭珠華》、文匯館主人託印的《小題宗海》、芹香館主人託印的《小題嫿》、三倉書屋主人託印的《小題真珠船》、三益書舍託印的《長搭小典文彙》、選青居主託印的《小題探驪》、松萱室主人託印的《巧搭網珊》、敏求書屋主人託印的《廣廣小題文府》等。點石齋敦請宿儒編選的彙選則有《小題觀海》、《巧搭大觀》等幾種。

#### 4.策問

清承明制，鄉、會試第三場試五道策問。雖說科考重首場，士子無需傾全力準備這場考試，但他們仍需對第三場考試做一些基本準備。而且殿試只試策問，試策優劣成為殿試高下的惟一依據，故而著眼於高中的考生，也不會忽視策問的研習。其中最取巧的方式是研習坊間層出不窮，五花八門的策學著作。<sup>89</sup> 點石齋也出版一些策學著作供士子研習，有《增廣策學總集大成》、《歷科試策大成》、《經策通纂》、《三狀元殿試策》等。

#### 5.試律詩

乾隆五十二年（1787），清廷在明代科舉考試的基礎上，在首場考試中增加了五言八韻試律詩一項，並成為定制，其地位與八股文同樣重要，越來越被當時的士子所重視。紀昀（1724-1805）的《庚辰集》是清人試律詩選本中最早且最有影響力的一部。《庚辰集》後，《九家試帖》、《七家試帖》、《後九家詩》等都是深受士子重視的試律詩選本。<sup>90</sup> 鑒於市面上的試律詩選本「或取法太古，眉樣未必嶄新，或

88 侯美珍，〈明清科舉八股小題文研究〉，頁 160-189。

89 劉海峰，〈「策學」與科舉學〉，《教育學報》，5 卷 6 期（2009），頁 117-118。

90（清）梁章鉅著，陳居淵校點，〈例言〉，《試律叢話》（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頁 494。

擇言太苛，眼界仍難廣遠」，申報館和點石齋傾向於出版自家編輯這類讀物。光緒五年三月，申報館在《申報》刊登〈搜印試帖詩啟〉：

本朝以文學取士，制藝而外兼重試帖，數百年來選家林立，然或取法太古，眉樣未必嶄新，或擇言太苛，眼界仍難廣遠。至《試律大觀》諸選則又以多為貴，無所取裁。今歲當三年大比之期，摩厲以須者尤宜預為揣摩以奏拈雅揚風之技。本館不揣冒昧，擬裒聚試帖詩五、六千首印行問世。奈見聞孤陋，集腋纂難用。敢佈告諸君子，如有平生佳作或友朋之作從未經坊間刊刻者，即請飭人交下本館，隨付收條。無論遠近，總以四月二十八日為限，過期不收。選成後統計每人送來之詩，入選二十首酬書一部，入選四十首酬書兩部，以下照此遞增，但須核對收條後奉贈。如選不滿二十首者，姑付恕情。其人選之原稿概不奉繳，以免周折。若一人之詩而為兩人同抄交下者，只能儘先次交到之人核算酬書，未能兩贈，尚希原鑒。此書排印裝釘工程浩繁，諸君大箸務祈從速交來，俾得早日蕙事尤所感盼。<sup>91</sup>

這次的徵集活動的反應非常踴躍，原定四月下旬截止接受試帖詩的期限，至四月初已收到二萬餘首，皆「隨珠和璧，美不勝收」，申報館刊登啟事通告接受試帖詩的期限已提前兩個星期至四月十五日結束。<sup>92</sup> 截止接受試帖詩後，申報館僅花費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就已編成選本，「擇其尤者得一千五百九十五首」，名《尊聞閣詩選初集》。「集中題目皆新穎可喜，而詩又清奇濃淡，無一不備，洵投時之利器也。各詩并加圈點，楚楚可觀」。<sup>93</sup> 並再接再厲，於七月出版《尊聞閣詩選二集》。<sup>94</sup> 和母公司一樣，點石齋也出版試律詩選本，包括《水流雲在軒試帖》、《試律時宜》、《五鳳樓試帖》和《悔蹉跎齋試帖》等幾種。

點石齋在美查總攬書局的業務期間共出版舉業用書近六十種，其中光緒十三年是書局出版這類圖書最多的一年，共十九種；其次為光緒十二年、光緒十四年和光緒十五年，各九種。由此可見光緒十二年後的四年是點石齋出版舉業用書的鼎盛期。

點石齋是申報館的附屬書局，它充分利用近水樓臺之便在《申報》刊登啟事徵

91 〈搜印試帖詩啟〉，《申報》，1879年4月12日，1版。

92 〈搜印試帖限期截止告白〉，《申報》，1879年5月26日，1版。

93 《尊聞閣詩選初集》出售，《申報》，1879年8月1日，1版。

94 《尊聞閣詩選二集》出售，《申報》，1879年9月7日，1版。

求舉業用書、舉業詩文以及宣傳新書（文末附錄「點石齋石印書局舉業用書出版簡目」即根據點石齋於光緒六年至二十九年在《申報》刊登書籍啟事與告白整理）。《申報》在 1872 年創刊時，報紙還是一種新事物並不為一般市民所接受，故《申報》在最初的一、兩年辦得十分艱難，其銷量一直維持在六、七百份左右。經過內容的不斷改善和先進技術的採用，使得該報的經營有了明顯的轉機，社會聲譽日隆，影響日益擴大，成為上海諸多報紙中最受歡迎的報紙之一。在創刊十七年後，其銷量擴大了十倍，約六千份左右，故而其所刊登的新書啟事和告白的影響力也不容忽視。<sup>95</sup>

除在上海設有總局與分局外，美查在光緒十四、五年間（1888-1889）於各省省城建立點石齋分莊達二十處，包括：

京都琉璃廠點石	金陵東牌樓點石
蘇州元妙觀點石	杭州青雲街點石
湖北三道街點石	漢口黃陂街點石
湖南省府正街點石	河南省城鴻影庵街點石
福建鼓樓前點石	廣州雙門底點石
四川重慶陝西街點石	成都省學道街點石
江西省貢院前點石	山東省貢院前點石
山西省貢院前點石	貴州省貢院前點石
陝西省貢院前點石	雲南省貢院前點石
廣西省貢院前點石	甘肅省貢院前點石 <sup>96</sup>

值得注意的是，點石齋書局多開設於各省省會，同時多在貢院之前，當是出自於精密籌劃。一則省會為文人學士匯集之地，留心圖書，必多購閱。二則各省會舉行鄉試，必有各地貢生前來應考，到省即必順便購書。「此即出於市場經營眼光，商業行銷之謀也。」<sup>97</sup>

95 呂佳，〈《申報》廣告設計風格演變探析〉（蘇州：蘇州大學藝術學院碩士論文，2009），頁 7。

96 申報館編，〈點石齋畫報〉（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二集午冊，頁 17。

97 王爾敏，〈中國近代知識普及化傳播之圖說形式——點石齋畫報例〉，頁 168。

光緒十四年，美查已入老境，想起久離祖國的家鄉，決定回國安度晚年，便將他所經營的事業，改組為「美查有限公司」。全部資金三十萬兩，同時招收外股。美查收回本利後在翌年回國。<sup>98</sup>

通過上文的論述，說明點石齋在精打細算，並深諳中國國情與文化的美查的長袖善舞的主持下，業務蒸蒸日上。在主理點石齋期間，美查對士子閱讀與作弊需求有清楚、完整的認識，緊隨考試內容與形式的要求，援用石印術的優勢，將資源投入在舉業用書的生產活動。除在成立初期出版工具書像《康熙字典》、《佩文韻府》、《臨文便覽》供士子參考外，還生產了近六十種經濟實惠、體積輕巧、便於攜帶的舉業用書像四書五經講章、鄉會試闡墨、八股時文彙選、試帖詩選本、策問選本等在全國銷售，來滿足年輕考生居家遠行時備戰科場、挾帶作弊的需求。

## （二）衰微至消亡期（1890-1903）

點石齋在舉業用書的出版的輝煌時期僅維持了十一年。隨著美查的離開，點石齋對這類圖書的出版的關注已顯著減少，其出版甚至出現了好幾年的空窗期。光緒十六年（1890）至光緒二十九年（1903）期間，點石齋僅出版了十五種舉業用書，和美查主持點石齋期間所出版的約六十種舉業用書比較起來，明顯少了許多。

追根究底，與申報館主持人的變動息息相關。美查回國後就不再過問美查有限公司之事，公司的業務由埃皮諾脫（E. O. Arbuthnot）全權負責。和熟悉中國文化的美查不同，埃皮諾脫「不諳華語，遇館事有所商酌，均由畢禮納傳譯」。<sup>99</sup>由於埃皮諾脫對中國文化沒有深入的了解，更不必說關注圖書尤其是舉業用書的出版了。<sup>100</sup>管理層異動後，點石齋在《申報》上刊登徵求孤本珍版以及出售點石齋書局出版的書籍啟事就不常見了。<sup>101</sup>更為重要的是，接棒的管理團隊也應當察覺市場對石印圖書的承受能力已亮起了紅燈。王韜（1828-1897）在光緒十三年至十五年（1887-1889）間寫給盛宣懷（1844-1917）的一封信說：「滬上書局太多，石印已至七八家，所印書籍實難銷售。」<sup>102</sup>當時報章也報導：「上海石印業很發達，其所印中

98 徐載平、徐瑞芳編，《清末四十年申報史料》，頁19。

99 雷璿，〈申報館過去之狀況〉，申報館編，《最近之五十年》，頁27。

100 實際上不僅舉業用書如此，申報館在美查回國以後也失去了對中國小說的出版熱情。詳參文娟，《結緣與流變：申報館與中國近代小說》，頁144-147。

101 徐載平、徐瑞芳編，《清末四十年申報史料》，頁334。

102 王爾敏、陳善偉編，〈王韜致盛宣懷函十七〉，《近代名人手札真跡·盛宣懷珍藏書牘初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7），頁3398。

國書以百萬計。這種情形對原有的印書業打擊很大。」<sup>103</sup> 石印書局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不僅給原有的木刻業帶來衝擊，競爭的白熱化亦使石印同業的經營日益艱難。多數石印書局對開發新書的積極性不高，在版權意識薄弱的時代追隨潮流大量出版暢銷書如《康熙字典》、《佩文韻府》、《大題文府》、小說，以及楹聯、碑帖、書畫等，勢必造成市場飽和而滯銷，進而影響資金的周轉。另外，《申報》在當時日銷六、七千份，售價已從初創時的八文增加至十二文。其廣告營業在美查離去前已相當發達，廣告版面擁擠，乃在當年將廣告價格上調一倍，<sup>104</sup> 報章的銷售與廣告的收入足以保證公司業績的持續穩定增長。在商業戰略與利益的考量下，申報館對石印圖書出版的熱情漸趨冷卻，不再是公司的核心業務。在上述原因的綜合影響下，點石齋在舉業用書的出版呈現衰頹，並在科舉制度廢止前消亡。

雖然對舉業用書的出版關注不足，但點石齋在這期間所出版的這類圖書仍是符合時代需求的。除延續美查主持時期所出版的四書五經類參考書，以及八股時文、策問、試帖詩選本外，還出版了一些根據科舉內容改變的舉業用書。

清代科舉改革始於戊戌變法之時，中間一度復舊。<sup>105</sup> 光緒二十七年（1901），清廷宣佈變通科舉考試，論自明年始，正式廢止八股，改試策論，終止了自明代以來實行了五、六百年的制藝取士之法。第二年（1902），會試分三場進行，頭場試中國政治史事論五篇，二場試各國政治藝學策五道，三場試四書義二篇、五經義一篇。進士朝考論疏、殿試策問，也都以中國政治史事及各國政治藝學命題。以上考試皆強調：凡四書、五經義，「均不準用八股文程式，策論均應切實敷陳，不得仍前空衍剽竊。」<sup>106</sup> 學者指出，策論在科舉改革中成為關注的焦點，與晚清「經世致用」思潮之興起密切相關。<sup>107</sup>

清代從改科舉到廢科舉，取士的標準有一個變化的過程。廢科舉前的十餘年間，取士的標準已是鼓勵新舊學兼通。「年來各省書院、歲科考經解、策論莫不講求西學。近來鄉闈禮闈三場問對均以時務為重。」<sup>108</sup> 山西舉人劉大鵬（1857-1942）

103 *North China Herald*, no. 1122, January 30, 1889, p. 114.

104 徐載平、徐瑞芳編，《清末四十年申報史料》，頁 73-77。

105（清）徐珂，〈考試改策論〉、〈考試復用八股文〉，《清稗類鈔》，第 2 冊，頁 595。

106（清）實錄館修纂，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整理，《清實錄》，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己卯，頁 412。

107 章清，〈「策問」與科舉體制下對「西學」的接引——以《中外策論大觀》為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8 期（2007），頁 77。

108 〈中西策學備纂〉，《申報》，1897 年 7 月 5 日，9 版。

在日記透露：「當此之時，中國之人競以洋務為先，士子學西學以求勝人。」<sup>109</sup> 取士標準的改變，士子所讀之書即隨之而變。<sup>110</sup> 時人描述：「近日書肆中時務之書汗牛充棟，其間有從西書中譯出者，有民間私著由耳食而得者，純駁不一，但取其備。各士子之入肆爭購，睨而視之者，不啻蟻之附羶，蠅之逐臭，蓋非此不足以為枕中鴻秘也」。<sup>111</sup>

因應於「採西學」、「重時務」的需求，晚清出版了多種西學彙編。<sup>112</sup> 《申報》對當時的出版業做出這樣的觀察：「書鋪之工於經營者，又能揣摩風氣，步步占先。如今科有三場出時務策題之說，於是將近人所著各書，分農學、礦學、算學、兵學以及聲、光、化、電諸學分門別類，綱舉目張。攜赴考市，購者雲集，有朝成書而夕已告罄者。」<sup>113</sup> 由此可見西學彙編極受重視，故而考生不落人後地爭購這些讀物。民營書局像點石齋也爭相編刊西學讀物，這股熱潮持續至科舉廢止。劉大鵬在日記中透露：科舉改制後，「時務諸書，汗牛充棟，凡應試者均在書肆購買」，故書商也乘機「高擡其價」。<sup>114</sup> 其中不少以「西學」、「新學」、「時務」為名的。如《西學大成》、《西學通考》、《中外時務策府統宗》、《中西時務格致新編》、《皇朝新學類纂》等。

點石齋也涉足出版西學讀物。光緒二十三年（1897）六月，刊登《新輯西法策學匯源》的出版預告：

本齋不惜重資敦請名人編輯是書，三閱寒暑，始克告竣。所採西國名師著述譯出之本，條分縷析，竟委窮源，是以西人言西法，非中國之人言西法也者。然西法者，不離於時務洋文。今本齋廣為搜集，不下數百種，擇其當今之要著、場屋之準繩，如匯如源，並非抄襲撮拾者可比。近觀各坊家所出之策論、算學等書橫行者，多字形極小。今本齋不遺餘力，精益求精，書歸直行，字形極大，購閱者以省目力。現已工竣，不日出書。茲以

109 劉大鵬遺著，喬志強標註，《退想齋日記》，光緒二十三年四月十七日（1897年5月18日），頁72。關於劉大鵬的生平，可參閱Henrietta Harrison, *The Man Awakened from Dreams: One Man's Life in North China Village, 1857-1942*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10 羅志田，〈清季科舉制改革的社會影響〉，劉海峰編，《二十世紀科舉研究論文選編》（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頁642-643。

111 〈論考試之弊〉，《申報》，1897年9月5日，1版。

112 章清，〈晚清西學彙編與本土回應〉，《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6期，頁48。

113 〈論考試有夾帶為古今中外之通論〉，《申報》，1897年9月15日，1版。

114 劉大鵬遺著，喬志強標註，《退想齋日記》，光緒二十九年三月初六（1903年4月3日），頁121。

篇頁過多，書分初二兩集。每訂二十本，每集洋八元。上海大馬路鴻寶齋暨湖南、湖北、漢口、蕪湖各分莊及各書坊發兌。<sup>115</sup>

同年還出版《時務通考》(圖5)，其出書啟事稱：

方今朝野上下皆以講求時務為急，而時務各書之總匯者惜無善本，僕等不惜重金，敦請名宿竭三年之力，採書五百餘種，成《時務通考》一書。……每總目中文分子目多或數百，少亦數十部，四百萬言，裝成廿冊，條分縷析，不落叢書口，經校讎兩次，精善無匹，且句讀清晰，尤便觀覽。此書專言時務，凡經史子集舊說概從略焉。廿八出書，每部實洋七元，躉買另章。京都琉璃廠大有堂，天津宮北紹蓮堂周宅，上海後馬路乾記棧內三處發售。<sup>116</sup>

該書分三十一類，下分綱目，再下為條目，共有條目 13192 條。此書「海內風行，揣摩家咸奉為圭臬」。像正在習舉業的朱峙三聽聞黃州有考市，立即趕去購買《時務通考》。「《時務通考》閱竣三分之二」後，使得他也「略知外國情況」，<sup>117</sup>可見此書是士子了解國外情況的一個「窗口」，在科舉改制後仍具參考價值，推動了點石齋在四年後出版該書的續集。<sup>118</sup>正、續兩編得到士子追捧，也吸引一些奸商偷天換月，「勦襲菁華，改名翻印」。<sup>119</sup>

科舉改制後，中外策論地位提升，八股文頓失地位，出版八股文集已不能給書商帶來利益，立即遭多數書商冷落，不再花費心思出版新編的八股文集，僅僅翻印科舉改制前影響力較大、銷路較廣的八股文集如《大題文府》、《小題文府》等。書商也將注意力從五言八韻試律詩，轉到出版與策論相關的舉業用書上。儘管策論體裁流傳甚久，但是對於常年習於八股文體的士子而言，仍然需要加倍努力才能掌握。《策學備纂》、《策府統宗》等書籍到了科舉改制後，已不能滿足士子的備考需求。應試士子既要周知本國古今政治與史事，於是二十四史、九通、《綱鑑》以及各種論說，又復盛行一時。<sup>120</sup>考生「無不慷慨解囊，爭相購買」當時書局所翻印

115 〈新輯西法策學匯源〉，《申報》，1897年7月7日，5版。

116 〈時務通考〉，《申報》，1897年7月20日，5版。

117 朱峙三著，章開沅選輯，〈朱峙三日記（連載第二）〉，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初十日、閏五月二十九日，中南地區辛亥革命史研究會、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編，《辛亥革命史叢刊·11》（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頁298-299。

118 〈跋時務通考續編〉，《申報》，1901年12月2日，3版。

119 〈翻刻必究〉，《申報》，1901年11月6日，3版。

120 陸費逵，〈六十年來中國之出版業與印刷業〉，頁14。

的「廿四史、《九通》諸書」。<sup>121</sup> 由於這些書是頭場命題的出處，考生都非常注意研讀，只是正襟危坐細讀這些卷帙浩繁之作的考生恐怕不多，於是書店刊印《歷代史事政治論》、《歷代史事論海》、《史鑑節要》、《通鑑便讀節本》、《綱鑑易知錄》等讀物來滿足欲操捷徑的考生的需求。其中，以《綱鑑》、《通鑑》等為名的歷史讀物最易吸引士子目光，不少俗陋士子僅僅「看過《綱鑑易知錄》而已」。<sup>122</sup>

對於這個改變，點石齋也作了相應的調整。光緒二十九年（1903）閏五月，點石齋出版了《歷代史事政治論》，其啟事云：

科舉改革，鄉會試首場試以中國史論，是非胸羅全史，學識闡通，決不能於場屋中拔幟制勝。然不博觀古今名人論史之作，則識見或不能恢擴，而思議筆力恐不能縱橫馳騁，卓然成家。是編係京師大學堂、江陰南菁學堂、松江融齋精舍諸高材生分輯，依涑水《通鑑》始於三家分晉，下迄有明。上而朝綱國政，下而吏治民生，凡經名儒碩學抒為偉論者，無不口取編錄。集書數百種，得文數萬篇，搜羅宏富，抉擇精嚴，誠乙部之鉅觀，非徒科場之鑰已也。付之石印，現已出書，都計三百零八卷，裝訂二十八本，定價洋銀四元八角。總經售處申報館及申昌書室、慎記書莊，其餘各書坊均有寄售。<sup>123</sup>

透露出它是應科舉新章而編寫的一部舉業用書。同年十月，出版《大字遼金元三史》，其啟事稱：

遼金元三史為近時極要之書，大小試場命題，兼及三史。局刻繁重，價值又昂，海內寒儒每苦力難購置，且三史中地名、人名之類率皆聳牙佶屈，記憶難清。臨時若不檢查，即素經流覽者，亦往往有舛舛之處，貽誤匪淺。此書最宜付之石印，以便取攜，而竟無人計及於此。今始由本齋用影石法縮印，選取頂上紙墨，故能字跡明顯，朗若列眉，平日用功既屬不費目力，而攜帶則尤極相宜。裝訂廿八冊，價極克己，祇收回工本洋銀四元八角。欲購者請臨英大馬路本齋、三馬路申報館、申昌及各書坊購取。<sup>124</sup>

自《大字遼金元三史》後，點石齋就終止了舉業用書的出版。

點石齋在美查離去後雖出版了八股文彙選、試帖詩選本、策問選本、西學讀

121 〈書肆概言〉，《申報》，1904年5月27日，1版。

122 公奴（夏清貽），〈金陵賣書記〉，頁312。

123 〈新出《歷代史事政治論》〉，《申報》，1903年7月9日，1版。

124 〈新印《大字遼金元三史》出版〉，《申報》，1903年11月27日，1版。

物、歷史讀物等舉業用書，但就量而言不僅無法與美查主持書局期間相提並論，從種類來說也有失全面，沒有充分把握舉業用書的一些出版熱點，失去了與同業競爭的優勢。

除西學彙編外，西學內容成分漸增的各種「經世文編」也是考生注意攻讀的讀物。自魏源（1794-1857）、賀長齡（1785-1848）編纂的《皇朝經世文編》（1826）問世後，遵其宗旨、仿其體例的續編之作賡續不絕，到光緒二十九年（1903）的《皇朝蓄艾文編》為止，至少有二十種之多。<sup>125</sup>成書於光緒十四年（1888）的葛士濬（1845-1895）的《皇朝經世文續編》是首先打破原書成例的一部續作。葛氏認為原書的許多內容已不敷時用，亟需加以變化以適應時代的變遷。於是葛氏在原書的八綱之外，專設「洋務」一綱，繫以洋務理論、邦交、軍政、教務、商務、固圉、培才等七目。至此之後，「經世文編」的其他續作的新學成分越來越多，舊學成分越來越少。<sup>126</sup>由於「經世文編」中所輯錄諸多文章的內容恰為當前時務，可資利用。而且，針對某一問題，「經世文編」往往羅列一種或多種建議，只要記誦相關內容，就能在考場上遊刃有餘地應付策問，故而它們成為大多數考生的讀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書籍。像劉大鵬、民初教育家楊昌濟（1871-1920）等都在日記中都留下了他們備考期間日夕研讀《皇朝經世文編》及其續作的記錄。<sup>127</sup>八股的廢除，策論在科舉考試中所佔地位大為提升，士子對於「經世文編」的需求也因之急劇攀升，龐大的市場需求刺激書賈編刊「經世文編」的熱情。1901年後遂成為各種「經世文編」競相湧現的時期，而引領這股潮流的是上海的各石印書局如積山書局、掃葉山房、鴻寶書局、慎記書莊、寶善齋、宜今室等。<sup>128</sup>點石齋在美查主持書

125 這些續編有張鵬飛《皇朝經世文編補》（1849）、饒玉成《皇朝經世文續集》（1881）、管窺居士《皇朝經世文續編》（1888）、葛士濬《皇朝經世文續編》（1888）、盛康《皇朝經世文續編》（1897）、陳忠倚《皇朝經世文三編》（1897）、求是齋主人《時務經世文分類文編》（1897）、甘韓《皇朝經世文新增時務洋務續編》（1897）、麥仲華《皇朝經世文新編》（1898）、求自強齋主人《皇朝經濟文編》（1901）、宜今室主人《皇朝經濟文新編》（1901）、邵之棠《皇朝經世文統編》（1901）、閻名《皇朝經世文統編》（1901）、何良棟《皇朝經世文四編》（1902）、金匱闕鑄補齋《皇朝經世文五編》（1902）、求是齋《皇朝經世文五編》（1902）、甘韓、楊鳳藻《皇朝經世文新編續集》（1902）、儲桂山《皇朝經世文續新編》（1902）、鄧玉賓《最新經世文編》（1902）、于寶軒《皇朝蓄艾文編》（1903）等。據黃克武，〈經世文編與中國近代經世思想研究〉，《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2期（1986），頁86-87，以及龔來國，〈清「經世文編」研究：以編纂學為中心〉（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4），頁3-4整理。

126 章清，〈「策問」與科舉體制下對「西學」的接引〉，頁78-79。

127 楊昌濟，《達化齋日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一八九九年（己亥）八月、九月，頁16-25；劉大鵬遺著，喬志強標註，《退想齋日記》，光緒二十二年（1896）十一月、十二月，光緒二十三年（1897）正月、二月，頁65-70。

128 龔來國，〈清「經世文編」研究：以編纂學為中心〉，頁1-4。

局期間於光緒十三年（1887）出版《皇朝經世文編》，此後沒有延續這一勢頭，趕上出版各種「經世文編」的熱潮。

科舉改制後，頭場和三場的論題尚可分別取法揣摩不可勝數的現成論策和八股文名篇，可是次場的聲光化電、天文格致、公法刑律等西政西藝之學，所涉更廣，不少考生茫茫然不知從何處用功。他們急需以西方知識體系為基礎的工具書，以圖獲得功名。一些書局注意及此，援用了西方百科全書的編輯原則，編刊了不少匯集中西文明知識的百科全書如《五大洲政治通考》、《泰西藝學通考》、《萬國政治藝學叢考》、《列國政治通考》等來給考生備考。<sup>129</sup> 這類書籍以條目形式，一詞一解，對已有的知識進行整理與概要記述。惜點石齋對此一出版熱點沒有予以正視。

總的來說，隨著石印圖書出版競爭的熾烈，加上美查離開前申報館在《申報》出版和廣告業務已取得相當理想的收益，促使接棒人改弦易轍，將業務焦點投放在報章的出版上，使得點石齋在舉業圖書的出版上不僅失去往日的光輝，最終在科舉制度廢止前劃下句號。

1911年，點石齋石印書局與古今圖書印書局、申昌書局等合併組成上海集成圖書公司，點石齋石印書局的出版活動也從此走入歷史。<sup>130</sup>

#### 四、餘論

通過對點石齋的舉業用書的生產活動的興衰起落的考察，反映書局主持人對出版決策制定與實施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在深謀遠慮的美查總攬書局的業務期間，點石齋對當時的圖書市場具有敏銳的洞察力，援用石印術的優勢，利用既有的資源像在《申報》刊登徵求佳作與詩文啟事，從而生產了林林總總、數量可觀、經濟實惠、小而便攜的舉業用書來滿足年輕考生居家遠行時備戰科場、挾帶作弊的需求。自美查離開後，隨著石印圖書出版市場競爭的日趨激烈，《申報》出版與廣告業務的蒸蒸日上，觸使精打細算的接棒人調整商業戰略，將重心偏向報章出版業務，減低對圖書出版業務的依賴。這個改變使得點石齋不僅失去了在舉

129 劉龍心，〈從科舉到學堂——策論與晚清的知識轉型（1901-190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8期（2007），頁106-117。

130 徐載平、徐瑞芳編，《清末四十年申報史料》，頁317。

業用書的出版上引領潮流的地位，並在科舉制度廢止前匿跡於在這類圖書的出版上。

必須指出的是，點石齋在成立初期的成功也改變了當時圖書出版業的環境，掀起了一股石印的熱潮，石印書局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創設。黃協塤在《淞南夢影錄》中指出：「英人所設點石齋，獨擅其利者已四五年矣。近則甯人之拜石山房，粵人之同文書局，與之鼎足而三。甚矣利之所在，人爭趨之也！」<sup>131</sup>除點石齋、同文書局、拜石山房外，蜚英館、鴻文書局、積山書局及鴻寶齋石印書局等亦具影響力。這些書局「所印各書，無不勾心鬥角，各炫所長。大都字跡雖細若蠶絲，無不明同犀理。其裝潢之古雅，校對之精良，更不待言，誠書城之奇觀，文林之盛事也」。<sup>132</sup>光緒年間，上海一地的石印書局至少有 116 家，<sup>133</sup>主要聚集在四馬路棋盤街。<sup>134</sup>此時上海的出版業之昌明，甚至凌駕北京之上，成為近代出版業的重心。<sup>135</sup>除上海外，北京、天津、廣州、杭州、武昌、蘇州、寧波等地也趕搭這股石印熱潮，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紛紛開設了石印書局。<sup>136</sup>此時石印術的運用達到了頂點，甚至還一度造成印刷紙張的缺乏。<sup>137</sup>

這些石印書局除刊印古籍、小說、詩詞外，也將部分重心部署在舉業用書的出版上，如同文書局光緒十一年（1885）的石印書目收錄圖書六十種，其中如《各省課藝彙海》之類的舉業用書計三十二種，佔總量一半以上。蜚英館除印古籍名著、各種秘笈如《正續資治通鑿》、《三希堂法帖》、《段氏說文》外，也利用石印可放大縮小的技術，印製適應考生攜帶方便的「場屋用之挾帶書，所謂巾箱本之兔園

131 黃協塤，《淞南夢影錄》（中國稀見地方史料集成，第 18 冊，頁 365），卷二。

132 委宛書僑稿，〈秘探石室〉，《申報》，1887 年 2 月 5 日，4 版。

133 吳永貴，《民國出版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頁 90。若包括採用其他印刷技術刊印圖書的書局，以及外地、外國書局在上海所設分店，當時在上海知見的書局超過 400 多家。參閱張仲民，〈晚清上海書局名錄〉，氏著，《出版與文化政治：晚清的衛生書籍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頁 321-324。

134 黎牀臥讀生輯，〈上海各業聚處〉，《繪圖上海雜誌》（中國稀見地方史料集成，第 18 冊，頁 70），卷六。

135 吳永貴在《民國出版史》中通過七組數據來論證上海在晚清已發展成為中國出版的中心，見頁 86-91。芮哲菲（Christopher A. Reed）在《谷登堡在上海：中國印刷資本業的發展，1876-1937》中在探討了 1876 至 1905 年間上海的石印業發展後，得出這時期為上海石印印刷商和出版商的黃金年代（*The Golden Age of Shanghai's Lithographic Printer-Publishers, 1876-1905*）的結論，見氏著 *Gutenberg in Shanghai*, pp. 88-127。

136 韓琦、王揚宗，〈石印術的傳入與興衰〉，頁 399。

137 蔡盛琦，〈清末點石齋石印書局的興衰〉，頁 27。

冊子」，深受考生的歡迎。<sup>138</sup> 從光緒初年到科舉廢除之間，掃葉山房採用石印術翻印同光間本坊的刻本外，也繼承了同光間刊刻書籍的特點，「印行適於科舉考試的書籍最多。所印 103 種石印書籍中，諸如《四書院課藝》、《紫陽課藝》、《清朝文錄》、《直省鄉墨》之類的書籍共 55 種，佔總量的一半之上」。<sup>139</sup> 一些書局甚至將方向鎖定在舉業用書的出版上，像鴻文書局專印舉業用書，如《五經匯解》、《大題文府》等類，不下數百種，便利當時士子獵取功名。在科舉改制前「曾風行一時，儒生幾乎人手一編」。<sup>140</sup>

不過，石印業的「黃金時代」僅維持了二十多年，其優勢地位被已改良的鉛印技術所取代。<sup>141</sup> 民營石印書局在科舉考試施行期間大獲其利，故而不乏書局將重心投入在舉業用書的出版上。「光緒三十一年（1905）八月，科舉制度完全廢止。從此，先前有關功名進取的石印科舉用書一律失去了市場」，「考試的書原售一、二元的，此時一、二角也無人要。大的石印書莊，因考試書的倒霉」。<sup>142</sup> 不少石印書局在面臨這個環境的衝擊瞬間，顯然應變能力不足。鴻文書局以雄厚的資金專印舉業用書，初期亦曾風行一時，從中牟取厚利。「迨戊戌政變，八股文既廢，大題、小題等書如同垃圾。然猶掙扎圖存，改編尊王攘夷的策、論、義諸書，可是已成強弩之末。隨後清政府終於廢除科舉，因此這種八股文學無人過問，鴻文書局損失不小。民國成立後，曾謀改弦更張，出版教科書，因乏資金，乃將石印書局出盤於吳某，改印舊小說。未及又將棋盤街的發行所出盤，全部資產葬送在封建文藝中」。<sup>143</sup> 以印科舉書為主的蜚英館同樣也一蹶不振，最後「只剩幾家專印古書或小說的小石印書坊」。<sup>144</sup> 這些石印書局幾乎把所有資源都押注在舉業用書的生產上，當與這些讀物相依相存的科舉制度被瓦解之際，來不及應變，加上庫存過剩，資金周轉不開，注定了失敗的命運。

[後記] 感謝匿名審稿人的詳細評論與寶貴建議，筆者獲益良多，於此特申謝忱。

138 〈藝林勝事〉，《申報》，1887年2月4日，3版。

139 楊麗瑩，《掃葉山房史研究》（上海：復旦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論文，2005），頁16，81。

140 秋翁，〈六十年前上海出版界怪現象〉，宋原放主編，《中國出版史料·近代部分·3》，頁267-268。

141 韓琦、王揚宗，〈石印術的傳入與興衰〉，頁401。

142 陸費遠，〈六十年來中國之出版業與印刷業〉，頁15。

143 秋翁，〈六十年前上海出版界怪現象〉，頁267-268。

144 陸費遠，〈六十年來中國之出版業與印刷業〉，頁15。

附錄 點石齋石印書局舉業用書出版簡目<sup>145</sup>

出版年份	出版月份	書名	
光緒八年(1882)	五月	增選多寶船	
	八月	臨文便覽	
	十一月	水流雲在軒試帖	
光緒九年(1883)	五月	小題文藪	
	七月	小搭珠華	
光緒十年(1884)	二月	五經體註	
	三月	四書典制類聯音註	
光緒十一年(1885)	五月	經藝淵海	
	五月	大題文彙	
	五月	增選藝林三場備要	
	六月	增廣策學總集大成	
	七月	小題宗海	
光緒十二年(1886)	十一月	詩句題解韻編總匯	
	三月	五經備旨	
	三月	乙酉科十八省闈墨	
	四月	丙戌科會墨	
	五月	小題嫻嬛	
	七月	藝林拱璧	
	十月	藝青閣典匯	
	十月	綱鑑易知錄	
	十月	增選泮林擷秀	
	十二月	小題真珠船初續集	
	光緒十三年(1887)	二月	四書典林
		二月	小題探驪
三月		國朝元魁墨萃	
四月		典制分類文稿	
四月		雲程必備	
四月		綱鑑易知錄	
四月		皇朝經世文編	
閏四月		增廣四書小題題鏡	
閏四月		大題觀海初二集	
閏四月		新選大題文富	
五月		小題宗海二集	
七月	試律時宜		

145 據點石齋於光緒六年至二十九年(1880-1903)於《申報》刊登書籍啟事與告白整理。

出版年份	出版月份	書名
	七月	五車樓五訂四書
	八月	四書典故竅
	十月	四書圖考
	十月	經藝文準
	十月	巧搭網珊
	十二月	長搭小典文彙
	十二月	翰墨林
光緒十四年(1888)	二月	歷科試策大成
	二月	事類統編
	四月	石印典制駢儷集成
	六月	經策通纂 (包括《經學輯要》和《策學備纂》兩種)
	七月	五經文準
	八月	廣治平略
	九月	五鳳樓試帖
	十月	九種彙解
	十一月	精印三層本佩文韻府
光緒十五年(1889)	正月	歷代名稿彙選
	三月	巧搭大觀
	四月	石印傳選戊子直省鄉墨
	四月	小題觀海
	四月	四書撮言
	五月	四書古註群義彙解
	五月	俞曲園太史時文
	六月	經藝淵海(重印)
	七月	經解精萃
光緒十六年(1890)	六月	三狀元殿試策
光緒十七年(1891)	五月	五經三萬選
	六月	大題文府
	七月	五經無雙
光緒十八年(1892)	三月	廣廣小題文府
	三月	小題一字文準
	五月	學彊恕齋筆算
	六月	悔蹉跎齋試帖
	十一月	增補三層四書味根錄
光緒二十年(1894)	六月	經策通纂續集

出版年份	出版月份	書名
光緒二十三年（1897）	六月	新輯西法策學匯源
	六月	時務通考
光緒二十七年（1901）	四月	時務通考續編
光緒二十九年（1903）	閏五月	歷代史事政治論
	十月	大字遼金元三史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清)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95。
- (清)申報館編,《點石齋畫報》,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
- (清)杜受田等修纂,《欽定科場條例》,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歷代科舉文獻集成5冊,2006。
- (清)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
- (清)張春帆,《九尾龜》,北京:戲劇出版社,古本禁燬小說文庫,2000。
- (清)梁章鉅著,陳居淵校點,《試律叢話》,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
- (清)黃協埴,《淞南夢影錄》,北京:學苑出版社,中國稀見地方史料集成18冊,2010。
- (清)實錄館修纂,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整理,《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1987。
- (清)趙爾巽等撰,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編纂,《清史稿校註》,臺北:國史館,1986。
- (清)劉大鵬遺著,喬志強標註,《退想齋日記》,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 (清)劉禹生,《世載堂雜憶》,北京:中華書局,1960。
- (清)蔡爾康,《申報館書目》,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中國近代古籍出版發行史料叢刊10冊,2003。
- (清)戴名世撰,王樹民編校,《戴名世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 (清)黎牀臥讀生輯,《繪圖上海雜誌》,中國稀見地方史料集成18冊,2010。
- (清)黎牀舊主編,《新輯上海彝場景緻記》,中國稀見地方史料集成18冊,2010。
- (清)顧炎武,《顧亭林詩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
- (清)龔自珍,《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 二、近代論著

- 《上海出版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出版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
- 上海市文史館、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室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上海地方史資料·四》,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
- 王建輝,《出版與近代文明》,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6。
- 王爾敏,〈中國近代知識普及化傳播之圖說形式——點石齋畫報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期,1990,頁135-172。
- 王爾敏、陳善偉編,《近代名人手札真跡·盛宣懷珍藏書牘初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7。
- 文娟,《結緣與流變——申報館與中國近代小說》,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 申報館編，《最近之五十季》，上海：申報館，1923。
- 李孝悌，〈走向世界，還是擁抱鄉野——觀看《點石齋畫報》的不同視野〉，《中國學術》，11期，2002，頁287-293。
- 李國榮，〈清代科場夾帶作弊的防範措施〉，《中國考試》，2004年7期，頁35-37。
- 呂佳，〈《申報》廣告設計風格演變探析〉，蘇州：蘇州大學藝術學院碩士論文，2009。
- 邵志擇，〈《申報》第一任主筆蔣芷湘考略〉，《新聞與傳播研究》，15卷5期，2008，頁55-61。
- 沈俊平，〈元代坊刻考試用書的生產活動〉，《書目季刊》，44卷2期，2010，頁43-80。
- 沈俊平，〈清代坊刻考試用書的影響與朝廷的回應〉，《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54期，2012，頁69-94。
- 沈俊平，《舉業津梁：明中葉以後坊刻制舉用書的出版與流通》，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9。
- 宋軍，《申報的興衰》，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
- 宋原放主編，《中國出版史料·近代部分·3》，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 吳永貴，《民國出版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
- 吳學文，〈《點石齋畫報》研究綜述〉，《文山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卷3期，2007，頁56-58。
- 林樹中，〈點石齋畫報與吳友如〉，《南京藝術學院學報（音樂與表演版）》，1981年2期，頁13-20。
- 周彥文，〈論歷代書目中的制舉類書籍〉，《書目季刊》，31卷1期，1997，頁1-13。
- 侯美珍，〈明清科舉八股小題文研究〉，《臺大中文學報》，25期，2006，頁153-198。
- 俞月亭，〈我國畫報的始祖——《點石齋畫報》初探〉，《新聞研究資料》，1981年5輯，頁149-181。
- 姚公鶴，《上海閒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祝尚書，《宋代科舉與文學考論》，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
- 陳力，《中國圖書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
- 陳平原，〈新聞與石印——《點石齋畫報》之成立〉，《開放時代》，2000年7期，頁60-66。
- 陳平原編，《點石齋畫報選》，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2000。
- 陳平原、夏曉虹編注，《圖像晚清》，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
- 陳平原、王德威、商偉編，《晚明與晚清：歷史傳承與文化創新》，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 高時良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 陸費達，〈六十年中國之出版業與印刷業〉，《申報月刊》，1卷1期，1932，頁13-18。
- 徐載平、徐瑞芳編，《清末四十年申報史料》，北京：新華出版社，1988。
- 殷秀成，《中西文化碰撞與融合背景下的傳播圖景：〈點石齋畫報〉研究》，長沙：湖南師範大學新聞學碩士論文，2009。
- 戚福康，《中國古代書坊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 商衍鑾，《清代科舉考試述錄及有關著作》，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
- 章清，〈晚清西學彙編與本土回應〉，《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6期，頁48-57。
- 章清，〈「策問」與科舉體制下對「西學」的接引——以《中外策論大觀》為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8期，2007，頁53-103。
- 張仲民，《出版與文化政治：晚清的衛生書籍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
- 張仲禮（Chang Chung-li）著，李榮昌譯，《中國紳士——關於其在19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
- 張毅志，〈中國近代著名的畫報——點石齋畫報〉，《圖書館學刊》，1989年3期，頁56-58。
- 張靜廬輯註，《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補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
- 黃克武，〈經世文編與中國近代經世思想研究〉，《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2期，1986，頁83-96。
- 黃夢紅《從點石齋畫報看清末婦女的生活形態》，南投：暨南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 鄔國義，〈近代海派新聞畫家吳友如史事考〉，《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1期，頁96-104。
- 楊麗瑩，《掃葉山房史研究》，上海：復旦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論文，2005。
- 蔡盛琦，〈清末點石齋石印書局的興衰〉，《國史館學術集刊》，1期，2001，頁1-30。
- 裴丹青，《從〈點石齋畫報〉看晚清社會文化的變遷》，開封：河南大學碩士論文，2005。
- 劉海峰編，《二十世紀科舉研究論文選編》，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
- 劉海峰，〈「策學」與科舉學〉，《教育學報》，5卷6期，2009，頁114-123。
- 劉祥光，〈印刷與考試：宋代考試用參考書初探〉，《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17期，2000，頁57-90。
- 劉祥光，〈宋代的時文刊本與考試文化〉，《臺大文史哲學報》，75期，2011，頁35-86。
- 劉龍心，〈從科舉到學堂——策論與晚清的知識轉型（1901-190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8期，2007，頁105-139。
- 謝菁菁，〈《點石齋畫報》研究的三個階段及其學術史意義〉，《江西社會科學》，2010年10期，頁213-219。
- 蘇全有、岳曉傑，〈對《點石齋畫報》研究的回顧與反思〉，《重慶交通大學學報（社科

版》, 11 卷 3 期, 2011, 頁 94-100。

- 龔來國,《清「經世文編」研究:以編纂學為中心》,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4。
- Britton, Roswell S. *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 Shanghai, Kelly & Walsh Limit eds., 1933. Reprinted Taipei: Ch'eng-wen Publishing, 1966.
- Brokaw, Cynthia, and Christopher A. Reed, eds. *From Woodblocks to the Internet: Chinese Publishing and Print Culture in Transition, circa 1800 to 2008*. Leiden; Boston: Brill, 2010.
- Chow, Kai-wing.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Cohn, Don J. ed. *Vignettes from the Chinese: Lithographs from Shanghai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Hong Kong: Research Centre for Translation,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7.
- Harrison, Henrietta. *The Man Awakened from Dreams: One Man's Life in North China Village, 1857-1942*.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Reed, Christopher A. *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1937*. Vancouver, B.C.: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4.
- Sinensis, Typograhus. "Estimate of the proportionate expense of Xylography, Lithography, and Typography, as applied to Chinese printing; view of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Chinese Repository*, 3 (1834): 246-252.
- Wagner, Rudolf G. ed. *Joining the Global Public: Words, Images, and City in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1870-1910*.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7.
- Ye, Xiaoqing. *The Dianshizhai Pictorial: Shanghai Urban Life 1884-1898*. Ann Arbor, Mich.: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3.
- North China Herald*, no. 1122, January 30, 1889, pp. 113-114.
- "Photo-lithographic Printing in Shanghai," *North China Herald*, no. 1138, May 25, 1889, p. 633.

## **Dianshizhai Lithographic Press and its Production on Examination Aids**

Sim Chuin Peng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Libraries

### **Abstract**

Dianshizhai Lithographic Press (or “Tien Shih Chai Photolithographic Publishing Works”), founded by British businessman Ernest Major (1841-1908) in 1879, had produced significant numbers of examination aids in its twenty-one year of business. These aids had greatly simplified the preparation of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and had helped prepare candidates in two major areas: knowledge they needed to acquire before they sit for the examination and techniques on answering the examination questions.

This paper examines lithographic-printed examination aids produced by Dianshizhai Lithographic Press in late-Qing dynasty. There are two sections and a concluding section in this paper. Section one outlines the establishment and growth of Dianshizhai Lithographic Press. Section two examines the rise and fall of examination aids produced by Dianshizhai Lithographic Press. The concluding section assesses the position of Dianshizhai Lithographic Pres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ublication. It also discusses the decline of the production of lithographic-printed examination aids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Keywords:** Qing dynasty, Dianshizhai Lithographic Press, lithographic techniques, examination aids, Ernest Major,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book produ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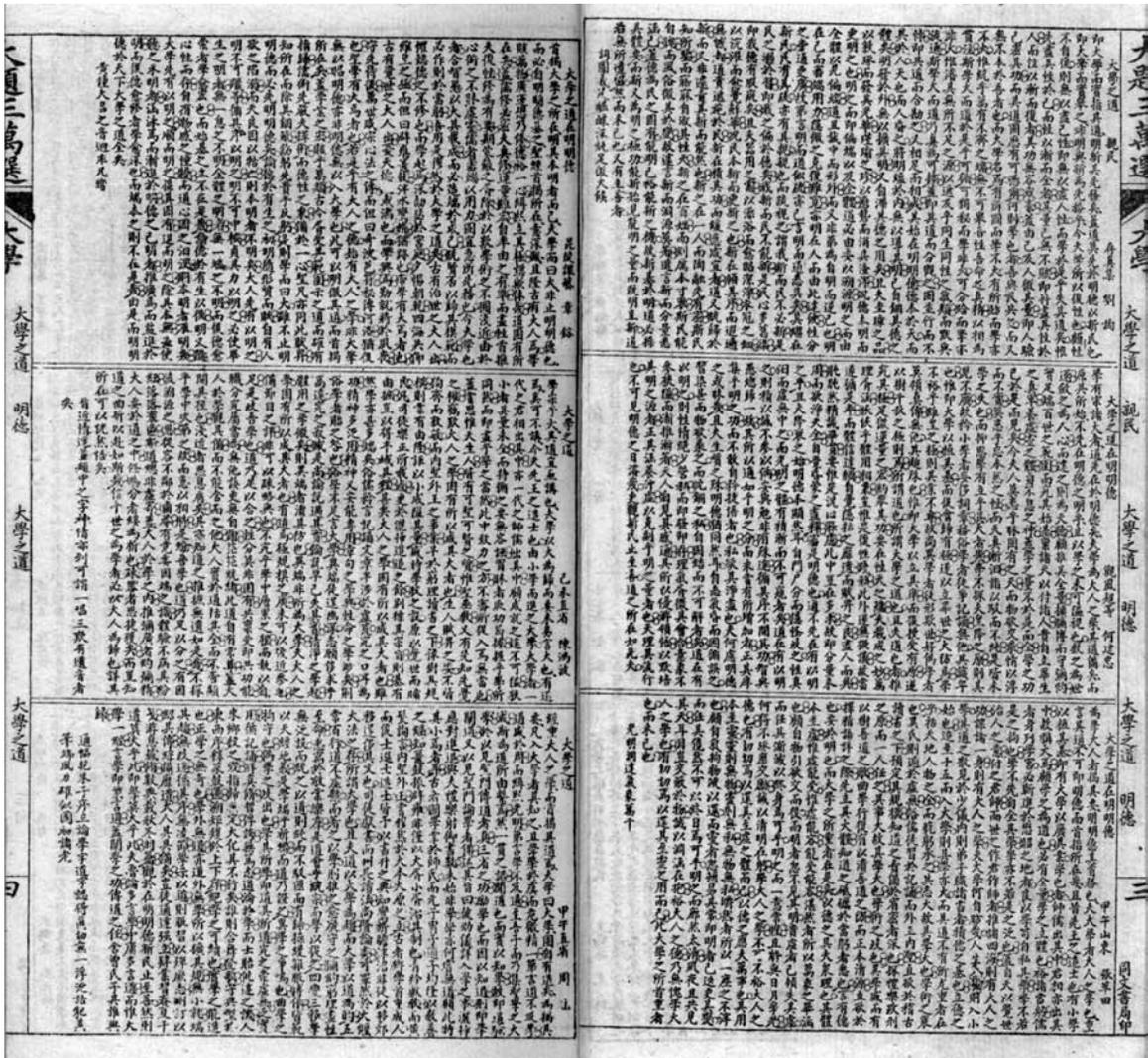


圖3 光緒十四年(1888)同文書局石印《大題三萬選》 版框高14公分寬7公分 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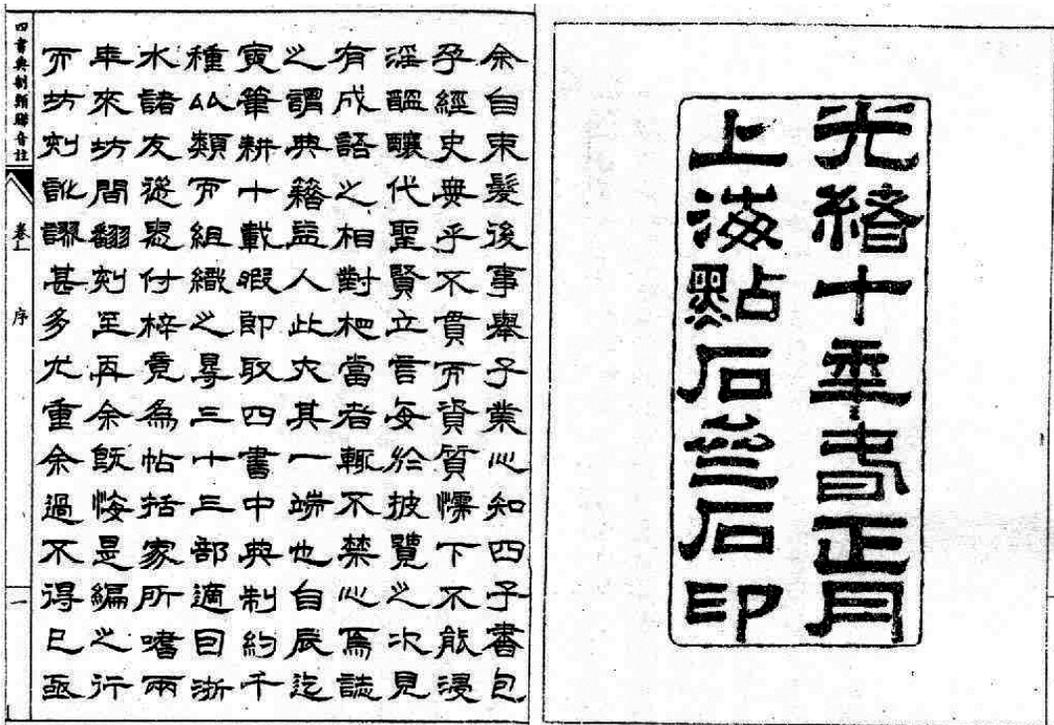


圖4 光緒十年(1884)點石齋石印《四書典制類音註》 版框高6.5公分寬4.3公分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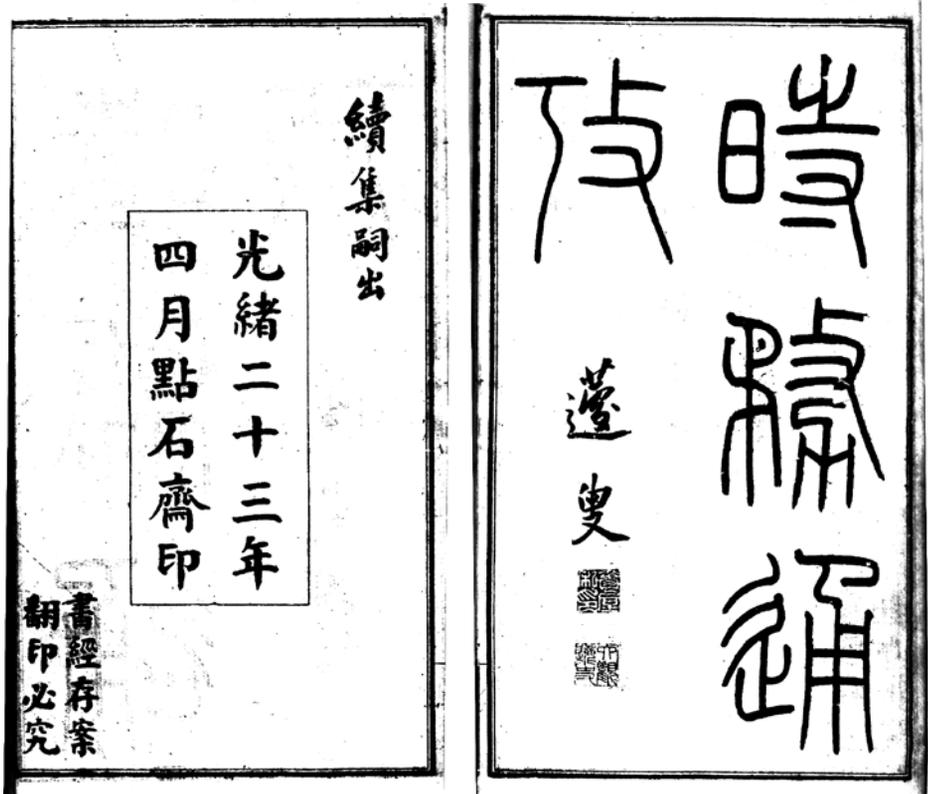


圖5 光緒二十三年(1897)點石齋石印《時務通考》 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藏

